百岁新生·风物

杨柳青年画

木版丹青绘盛景

绘制杨柳青年画。

日前，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与西青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非遗主场活动在西青区杨柳青古镇隆重启幕。在现场众多非遗展品中，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最令人瞩目。

杨柳青年画，全称为“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中国明朝永乐年间至崇祯年间，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及漕运的兴起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杨柳青年画随之兴起。“杨柳青青似画中，家家绣女竟衣红。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这是天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笔下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杨柳青木版年画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首，与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清代初期，杨柳青木版年画风靡一时。相传画坊最多时能占半条街，有十几家之多，其中以两家最大。一家是戴廉增，戴生于雍正十三年，祖上在杨柳青设画坊，传至他已九世。一家是齐健隆，在康熙年间从山东迁至天津，开始经营裱画，后才发展成为年画坊。

清末民初，农村凋敝，石印年画兴起，杨柳青年画生产日渐衰落。抗战时期更是损失惨重。画店相继倒闭，至新中国成立前已濒于艺绝人亡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杨柳青年画重见天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到杨柳青画社视察。经党和人民政府的多次抢救、搜集、挖掘、整理，杨柳青年画才得以重获新生。

2006年，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王文达是杨柳青木版年画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与杨柳青年画的情愫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1960年，杨柳青画社到周边省份招录学员，16岁的王文达凭借孩提时代临摹连环画的基础考进画社“年画训练班”。当年春节，他背着行囊从河北省青县坐火车来到杨柳青镇，师从武强年画名师肖福荣、李长江，得到传统木版水印刻版技术的真传。

杨柳青木版年画讲究“勾、刻、印、绘”四道工序，其中刻的难度最大，“以刀代笔”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精髓所在，那是现代化的机器也无法替代的手工技艺。一辈子用刀在木头上行走的王文达深深热爱着这门民间艺术，他说：“年画技艺的关键在于一刀一笔之间的贯气，深厚的文化积淀体现在刀尖上的是严谨和深沉，这一点需要用心去体会。传承是一项艰难但意义重大的事业，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培养年轻人。”

泥人张彩塑

民间艺术闯市场

天津泥人张彩塑艺人整理作品(新华社发)。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推出了《古田会议》《百年觉悟》两组彩塑作品。其中《百年觉悟》突显天津特色，工作室的工艺美术大师陈毅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走访觉悟社旧址，查找资料、咨询专家，选取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郑季清六位成员，以传统彩塑艺术形式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走出觉悟社，奔向理想”的光辉形象。

在旧时天津民俗中，到娘娘宫拴娃娃，拴来的就是个泥人，过去捏泥人的手艺人不少，唯有泥人张与众不同。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从八九岁起学做泥人，其作品多以三百六十行普通劳动者或是“木兰从军”“风尘三侠”等民间故事为题材，被赞誉为“胜于写真”。他的泥塑作品汲取了绘画艺术的笔调，又类似于木刻的“刀味”，给人以艺术震撼。

张明山之子张玉亭的泥塑作品线条愈加简练，人物造型更趋于生动活泼，代表作《麻姑仙女》以绘画的线描技法表现人的动态，衣褶流畅，袍袖带风。他的另一件彩塑作品《钟馗嫁妹》于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展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氏家族后人迫于生计纷纷改行，只有第三代张景祜靠捏点简单易卖的泥人维持生活。1953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成立初期，陈列品仅包括三个部分：中国原始社会、古代历史文物、天津地方民间雕塑家泥人张专室。八十多岁的张玉亭也被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荣誉馆员。张景祜到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任教，彩塑艺术走进高等学府。

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新的彩塑人才，成立“天津泥人张彩塑场”，招收了一批热心于彩塑艺术事业的年轻学员，创作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张氏技艺由一个家族的艺术活动发展为社会性的彩塑事业。

泥人张第四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铭，他的作品《粗中有细》刻画出一名木匠聚精会神的表情，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工作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泥人张作品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天津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穆森认为：“泥人张是天津民间艺术的典范，是天津历史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

小站稻

稻花香里庆小康

我市涉农区种植的优质小站稻收割。

2021年初夏，“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逝世。天津人民难忘他曾在2005年来津考察小站稻，他说：“要进一步提高天津小站稻产量和质量，让老百姓在吃饱的基础上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让人们口中的稻米吃得更香甜。”

当此时节，津门小站草木葱茏，稻田的水光里倒映着蓝天白云，弯腰忙碌的身影便落在云朵上。这是插秧最好的时节，100万亩小站稻已插秧入田，面积比去年增加20万亩，覆盖全市10个涉农区。“小站稻亩产已达1200斤，在高产同时更注重品质上的把控，在品种选择、基质育秧、田间管理等环节都有科学系统的流程，使稻米的品质优异、外观晶莹、清香适口。”站在田头的天津农学院教授崔晶是小站稻种植专家，他戴着草帽，看着插秧机滚滚开动。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国家南繁基地考察，曾关切地询问天津小站稻的情况，同时鼓励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要勇于创新，为全国人民从吃饱到吃好作出更大贡献。天津市委随后提出《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2018—2022年）》，大力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充分挖掘小站稻古贡米资源，推行现代化、标准化、绿色化的生产技术模式，拓展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小站稻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全市种植面积由30万亩跃升至目前的100万亩。标准体系基本建成，实现了从品种选育、绿色栽培到收储加工全链条有标可依。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成立了小站稻研究院，建立了“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搭建起支撑产业振兴的“四梁八柱”。小站稻作为我市第一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被列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行列，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百年风云，海河从天津蜿蜒穿过，小站稻见证了天津城市的巨大变迁。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当时小站的一些官僚、军阀和封建地主趁机掠夺大量土地。日军侵占华北后，跑马圈地，强占民田20余万亩，无数稻农被逼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新中国成立前夕，水稻亩产量仅400斤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小站稻生产得以大力发展。今天，小站稻米质已达到国际一级标准。2020年，小站稻种植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何玉新 苏鹏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玉祥 孙立伟